

## 北京大學與歷史研究\*

何芳川  
北京大學亞太研究所

尊敬的各位同行專家，朋友們：

今晚能出席這個盛會，深感喜悅榮幸！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的朋友們，懷著獻身學術的理念，在這開闢了近代史研究的園地，開闢了一片高層次、雅文化的淨土和沃土，並以此為基地，聯絡海內外同行，共同為歷史學的發展與繁榮，辛勤耕耘，令人敬佩！承蒙學會領導的寵邀，讓我作一個簡短的發言。茲就內地與香港在近代史領域的學術交流，談一點淺見，向各位請教。

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不是古代中國的自然延續，而是被來自西方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大潮捲入近代的。古老的中華帝國，璀璨的中華文明，從世界歷史舞台中央被推向邊緣；中國，從積極、主動的歷史角色，演變為消極、被動的角色。在這一扭曲的轉化過程中，外部環境、因素、外部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極為重要。這種情況，是古代史上所沒有的。因此，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同16世紀以後的世界歷史研究，同明清以後中國歷史的研究，密不可分。1949年以後，內地近代史研究，在相當一段時期，局限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文革”結束後，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變和進步，但仍不夠。在這方面，還需要下大功夫。

同時，近代中國的發展，不僅是從一個中央帝國淪為半殖民地的政治變化過程，也不僅是這一政治變化中的民族抗爭與民眾革命鬥爭，而是整個社會從傳統向著現代痛苦蛻變和轉化的全方位，深層次變化過程。這一深刻的變化過程，也是古代史上所沒有的。因此，近代中國的歷史研究，同對這個社會的社會學的、經濟學的、政治學的、法學的、科學的乃至整體文化的研究，密不可分。同樣的，1949年以後，內地對近代史的研究，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局限於政治領域，而在政治領域又多限於階級鬥爭、革命戰爭。改革開闢以來，這種情況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和進步，但也還不夠。對於近代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全面的、深層次的動態剖析，也還需下大功夫。

由於上述兩個方面的學術缺失，不是一時一地的缺失，而是從1949-1978年全國性的近兩代人的學術缺失，因此補償起來，更需要三代、四代人的整體努力。加之，近年來市場經濟大潮衝擊著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土壤，整個社會出現了浮躁的民族症狀，從經濟到文化、教育，直至學術領域，泡沫現象不容低估，這就給這一學術補償任務，平添了艱難性。

就我所知，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香港同行朋友們在學術傳承、教育背景、研究視野、學術規範、外文水準乃至國際學術交流諸方面，都有著很深的積淀和很多的長處。因此，我們內地學者應在大力加強與香港同行學術交流中，誠懇地學習、汲取諸君之所長，使內地的學術獲得更扎實的進步！

借此機會，我還願意代表北京市史學會向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和在座各位致意。我已同黃嫣梨會長、周佳榮、李金強、林啟彥諸位教授約定，我們兩會將加強合作，聯合舉辦學術活動，為增進京港學術交流，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 本文是2003年2月28日晚作者在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3年年會上的講話內容。

---

## 【專題討論】

### 武則天的女性觀\*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王雙懷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中國封建社會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女性的社會地位相當低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sup>?</sup>，武則天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寶座，可以算是一個奇蹟。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的女性觀是怎樣的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討。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了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中有明顯的重男輕女的傾向，《尚書》〈牧誓〉上說：“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大雅·瞻卬〉也說：“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根據這些經典理論，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牢固的觀念，認為男為陽，女為陰，男人應當主外，女人應當主內。在這種觀念之下，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的範圍之內，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權力和參加社會活動的自由，“男尊女卑”成為“正常”的社會現象。在唐代前期，這種情況已相當嚴重。

武則天認為，男女之間在性別上雖有所差異，但不應當有尊卑貴賤之分。雖然她沒有對女性問題進行全面論述，但十分不滿當時男尊女卑的情況，在參預朝政和當皇帝期間，會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張旗鼓地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

首先，武則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打破了女子不能參預朝政的舊規。顯慶五年（660年）十月，因唐高宗患了“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的病，武則天開始以皇后身份參預朝政。<sup>1</sup>龍朔元年

(661年)十二月，她向唐高宗上書，“建言十二事”，被唐高宗採納。<sup>2</sup>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權臣上官儀被殺後，她的權勢逐漸上升：“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sup>3</sup>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病死，她以皇太后的身份臨朝稱制，平定了徐敬業和越王貞發動的叛亂，從而穩定的當時的局勢。天授元年(690年)九月九日，她又在群臣的擁戴下，改唐為周，成為大周的“聖神皇帝”，<sup>4</sup>直到神龍元年(705年)退出政壇。她一生先後參預朝政23年，臨朝稱制7年，當皇帝15年，總計在政治舞臺上活躍了45年，將近半個世紀。她認為女子具有參政的才能，可以處理好政事，所以她在當皇帝期間，會讓上官婉兒等人參預朝政。史載上官婉兒“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稱。自通天(696年)以來，內掌詔命，綽麗可觀。……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sup>5</sup>所有這些，都向世人宣告：女性同樣具有政治才能，同樣可以處理政事，而且可以處理得很好。

其次，武則天向“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發動猛烈的衝擊。當時，男尊女卑的現象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有體現。例如在婚姻上，男子可以納妾，可以置“別宅婦人”，女子則只能“從一而終”。在喪葬方面，父在，只為母服喪一年；而母在，則要為父服喪三年。男子可以當官做老爺，從事各種社交活動；女子只能在自己家轉。武則天對這些現象都會提出過挑戰。

史載，武則天當上皇后不久，即通過唐高宗下令，要求天下男女按時婚嫁，做到“內無寡女，外無曠夫”。嚴禁男性設置“別宅婦人”。她向唐高宗上書，要求改變在服喪問題上長期存在的歧視女性的現象。她說：“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為母服止一。尊父之敬雖周，報母之慈有缺。……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sup>6</sup>並且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唐高宗按照她的要求對這個問題作出新的規定。

麟德二年(665年)十二月，唐高宗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及有司進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武則天認為這種規定對女性不公，要求改革禮儀，在社首祭地時，由她率六宮命婦充當亞獻。<sup>7</sup>她說：“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禪之含義，竊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識，恐未周備。……伏望殿禮之日，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殿虔拜之儀。……冀聖朝垂則，永播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sup>8</sup>唐高宗採納了她的意見，決定禪社首的活動主要由女性來承擔。

在改朝換代前後，武則天進一步樹立了女性的權威。嗣聖元年(684年)徐敬業等人舉兵造反。許多王公大臣也起來反對武則天。武則天以鐵腕手法迅速平定了叛亂，殺掉與叛亂有關的裴炎和程務挺等人，然後把群臣召集到便殿，加以訓斥。她說：“朕無負天下之望，汝知之乎？”群臣唯唯。她又義正辭嚴地說：“朕侍奉先帝(高宗)二十餘年，憂勞天下。公卿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樂，朕所養也。先帝以天下托朕，朕不敢愛己身而愛百姓。今為戎首者皆出於將相。何負朕之深也。汝等有受遺老臣倔強難制如裴炎者乎？有將門貴種糾合亡命如徐敬業者乎？有握兵宿將攻戰必勝如程務挺者乎？此三人者皆人杰也，然不利於朕，朕能戮之。汝等有過之者早為之；不然，則悉心事朕，無遺天下笑。”群臣聽後跪伏頓首，不敢仰視，都說：“唯陛下所使。”<sup>9</sup>這是何等難得的場面！久經沙場的武將和學富五車的文臣都不敢說一個“不”字。如此眾多的男子漢都跪倒在一個女人的腳下，還有甚麼“男尊女卑”可言！

再者，武則天積極鼓勵女子移風易俗，<sup>10</sup> 參加社會活動。早在顯慶五年正月唐高宗幸文水縣時，武則天即召集故鄉的鄉父老歡慶，她特別邀請女性參加，“城內諸婦女年八十以上，各版授郡君，仍賜物等。”<sup>11</sup> 臨朝稱制後，她放寬了對婦女的清規戒律，鼓勵女性參加有益的社會活動。明堂建成後，她讓洛陽一帶的婦女自由觀看，“久之乃罷。”<sup>12</sup> 她曾規定，凡大朝會時，命婦可與百官雜處。女性出行，戴帷帽即可，無需遮蓋臉面。婦女可以騎馬、射箭、打球或踏青旅行。也可以在大廷廣眾之下表演自己的才藝。對於在保家衛國的爭中做出貢獻的女性，武則天更是大力宣傳，並予以重獎。如突厥南侵時，戰爭打得十分激烈。平州刺史鄒保英的妻子奚氏助夫作戰，“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武則天知道後即封她為“誠節婦人”。<sup>13</sup> 又如突厥攻飛狐縣時，縣令古元應的妻子高氏助夫守城，戰功卓著，武則天亦下制褒美，封她為徇忠縣君。<sup>14</sup>

此外，武則天還鼓勵女性學習文化，提高自己的才能。武則天本人喜歡歷史、文學、書法、繪畫、音樂和舞蹈，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sup>15</sup> 當皇后時，她組織“北門學士”撰寫《列女傳》100卷、《古今內苑》100卷、《內範要略》10卷、《保傅乳母傳》1卷，<sup>16</sup> 供女性學習。當皇帝後，她除重用才女上官婉兒外，還大力提倡文學。她特別喜歡有才華的女性，甚至親自接見有才氣的小女孩。史載如意年間（692年），有一位九歲的少女善作詩，武則天把她召進宮中，親自測試。這個女孩思維敏銳，“皆應聲而就”。其兄將返回故鄉，武則天命作詩以送之，即脫口吟道：“別路去初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飛。”武則天愛其才，便把這個女孩留在了宮中。<sup>17</sup> 對於前代有才華的女性，武則天也十分推崇。如前秦時，有位才女叫蘇若蘭，曾織錦回文，作〈璇璣圖〉。“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首。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殫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武則天對此極為欣賞，專門寫了〈織錦回文紀〉，認為“近代閨怨之宗”。<sup>18</sup>

從上述情況來看，武則天的女性觀頗有男女平等的傾向，是相當進步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她不僅以自己的行動向“男尊女卑”的禮教挑戰，而且採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確屬難能可貴。現時研究唐代女性的學者，大都認為唐代的女性比較開放。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武則天實有很大的關係。武則天的女性觀對唐代女性地位的提高頗有影響，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 這是王雙懷、周佳榮合作進行的“唐代女性研究計劃”的一部分，本文由王雙懷執筆。

1. 《資治通鑑》卷200，顯慶五年十月；《唐會要》卷3。
2. 《新唐書》卷76〈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傳〉。
3. 這是《資治通鑑》卷201的記載。《新唐書》卷76〈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傳〉載：“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雖然二書的記載不盡相同，且誇大了當時武則天的權力，但都說明武則天的地位逐漸尊崇。
4. 《資治通鑑》卷204，天授元年九月。
5. 《新唐書》卷76〈上官昭容傳〉。
6. 《全唐文》卷97，高宗武皇后〈請父在為母終三年服表〉。
7. 《舊唐書》卷23〈禮儀志〉。
8. 《全唐文》卷97，高宗武皇后〈請親祭地祇表〉。
9. 《新唐書》卷76〈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傳〉，《資治通鑑》卷203〈考異〉引〈唐統記〉。

10. 《新唐書》卷106〈邢文偉傳〉。
11. 《舊唐書》卷4〈高宗紀〉，《資治通鑑》卷200，顯慶五年三月。
12. 《舊唐書》卷22〈禮儀志〉二。
13. 《舊唐書》卷193〈鄒保英妻笑氏傳〉。
14. 《全唐文》卷96，高宗武皇后〈封古元應妻為徇忠縣君詔〉：“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沒。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夫人懷忠，不憚流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升，何以獎勸。古元應妻可封街忠縣君。”
15. 參趙文潤、王雙懷《武則天評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第十三章。
16. 《舊唐書》卷46〈經籍志〉。
17. 《唐詩紀事》卷78。
18. 《全唐文》卷97，高宗武皇后〈織錦回文紀〉。

---

## 【專題討論】

# 顧維鈞與辛亥革命

沈潛

江蘇常熟高專人文系

〔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急劇遞嬗的社會轉型為依託，也即以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變遷為場景，通過追尋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從一名上海少年到赴美留學再到學成而歸躍登民初政壇的成長軌跡，力圖揭示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大變動中因時乘勢的心靈歷程以及由此氤氳化育的經世品格。

〔關鍵字〕顧維鈞；辛亥革命；西學教育；民初外交

迄今為止，有關顧維鈞與中國近代外交的話題，愈來愈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作為享譽國際的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家，顧維鈞從風雨如晦的清末民初一路走來，先後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歷任外交要職，一生為弱國爭外交，為維護國家主權和捍衛民族利益，折衝樽俎達半個世紀之多，譜寫了自己以外交服務於社會的經世篇章。因此，不少論者圍繞其外交思想及其實踐活動，開展了多方面的有效探討。但就顧維鈞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活動，則少有專文涉及。有鑒於此，本文略加論述。

## （一）

人所共知，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西方殖民者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外來侵略勢力從沿海沿江向內陸腹地步步深入。在與列強發動的侵華戰爭幾經較量後一次次敗下陣來的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個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權喪國辱之事接踵不斷。時至19世紀90年代

起，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戊戌變法運動的夭折，義和團反帝鬥爭的扼殺，更有八國聯軍脅迫簽訂的《辛丑和約》所帶來的空前國難，使中國幾乎完全喪失了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獨立，完全淪為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危機意識催生憂患意識。內外交困的民族危機，啟動了每一個有志於經世者的憂患心魂；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前呼後應、相繼相續的主旋律。生當其時的顧維鈞自不例外。

1888年出生於上海的顧維鈞，其祖輩曾是古城嘉定的仕宦首戶之家，因太平軍的烽火蔓延，家道隨此敗落。乃父顧溶幾經艱難，先在官辦招商局的一條輪船上謀職“幫帳”（會計），此後又升任上海兵備道財政主管。數十年經商致富，家境漸趨殷實。幾乎自手起家的顧溶在遭此人生際遇後，對兒子於所懷者大，所望者深，按照他的計劃，指望顧維鈞走一條通過科舉入仕而光耀家族的理想人生道路。

但是世風變動，新潮湧起，與西力東侵下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過程相伴隨，近代中國開始了一個西學東漸下走出中世紀走向近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到顧維鈞所處世紀之交的轉捩點上，伴隨歐風美雨襲入中國的西方文化，經過半個多世紀從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層面的漸次展開和深入，已如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輸導入華，人心思變幾乎普被全社會。位居“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的上海，以其開埠通商的特定地域環境，更是理所當然地得時代風氣之先。1902—1911年度的一份上海海關報告稱：“自義和團動亂以來，包括政府官員、知識界紳士以及商人階級在內的人士普遍地確認，向西方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反對西式教育的人幾乎不見了。”<sup>1</sup>一時間，廢科舉，興學堂，派遊學，風氣所趨，今非昔比。

趕上這個求變趨新的時代，少年顧維鈞所要邁開的成長步伐，已很難像他父親指定的那樣墨守陳規了。一代新人隨之氤氳化育。

1895年甲午戰敗，年僅8歲的顧維鈞“雖不完全理解其後果，但感到沮喪。”<sup>2</sup>1898年百日維新時，顧維鈞當然仍不會有深刻的切膚之感，但“我和其他人，包括我們家庭和廣大民眾的感受，都模模糊糊地希望維新運動能夠成功”，<sup>3</sup>“我們感到到處是維新的呼聲，並覺得這是好事”。<sup>4</sup>少小的心靈深處，既隱含了對清政府的失望和不滿情緒，也萌生了心向革新圖強、洗刷民族恥辱的願望。

1900年，顧維鈞考入了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的前身）。這所由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施約瑟創辦於1879年的教會學校，自1888年卜舛濟任校長，更加注重朝著西式完整教育的高等學府目標努力，特別強調英文和數理化等課程教育，以使學生在西方文化薰陶下，理解並接受西方的智慧，推動基督教事業的傳播和發展。

自進入聖約翰的四年校園生活，新型的教學內容和方法，擴大了顧維鈞的認知空間和求知視域。來自一位留日歸國教師富有新思想的啟蒙，更增強了他對時事的關心和對新知新學的渴望。在這校新教師接任的中文課上，並不要求學生閱讀和背誦經書，而是按不同題材，或據以經書引文，或讀報紙社論，介紹時事政治。歷史課上新教師一改聖約翰只教英美史，不教中國史的傳統，生動地講述起中國歷史名人，包括著名政治家、軍事將領和愛國志士，顧維鈞和同學們總是聽得格外出神和激動。

在顧維鈞的心目中，對於康梁的變法政綱，認識是模糊的，但“總的感覺是中國每次和列強打交道，都以失敗告終。我們發現這是令人最厭惡、最沮喪的，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和該怎麼辦，我們模糊地感到改革是個好主意，而並不瞭解其真正的意義。”<sup>5</sup> 顧維鈞留意到，當時公眾輿論對於庚子國恥怨聲載道，普遍指斥清廷在對外關係方面處理不當，以致帶來巨大災難。在校期間，顧維鈞及其同學充滿了對現實的迷惑和對未來的憧憬。正如他後來追憶：“我認為主要是由於新教師的思想的緣故，我和我們同學越來越感到需要變革，但這所說的變革，並不是政府機構的變革，也不是重大政治制度的變革，因為我年歲太小，對這些還不能理解。我們只是感到有些事不對頭，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同時，有些學生對西方教育的興趣日濃，一批接一批地到外國求學。這對我和同學們影響很大。”<sup>6</sup> 同班有施氏兄弟倆，其叔伯施肇基和施肇祥，當初就是從聖約翰畢業後去了紐約康奈爾大學，學成回國不久便官運亨通，聲譽日隆。

就此，改革風潮的鼓蕩，西學教育的櫛沐，榜樣力量的感染，使一批如顧維鈞等可塑性極強的少年，雖稚氣未脫，卻已志存高遠。適逢世紀初的出國留學熱潮，顧維鈞覺得“這正是中國的需要，我因而也想接受新教育。”<sup>7</sup> 1904年8月，剪髮易服後的顧維鈞在父親自備資斧下告別故土家園，踏上了放洋留學的航程。

## (二)

初到美國，顧維鈞先在紐約庫克學院預備學習。至1905年9月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一年後很快確定了以主修政治和國際外交為自己的學業方向和人生目標，決意在處理外交關係方面為改善國家的狀況做一些事情。

按他的想法，“我是個來自異國的學生；我不僅想學到知識，而且想瞭解這個國家的人民和生活。”<sup>8</sup> 抱此心願，顧維鈞在專業學習的同時，熱心參與各種課外活動，且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此外先後擔任了校刊《旁觀者》的總編、《哥倫比亞大學月刊》的業務經理和《哥倫比亞人》的編輯成員，以及全美中國留學生刊物《中國學生月刊》的主編。所有這些課外活動，不僅使他對校園生活有了深刻瞭解，也加深了對美國社會的認識，並大大有助於提高自身的社交活動能力。

據統計，1900年中國留美學生10餘人，1905年30多人，1910年500多人，1911年為650人。曾有人在《留美學生季報》上對二十世紀初期的留學生大體作過如下五種分類：一為文士派，只知讀書，不管其他；二為留外派，以為外國的一切皆好，中國的一切皆不足論；三為流學派，隨波逐流，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四為名譽派，沽名釣譽，濫竽充數，以為留學鍍金即可聲價十倍；五為求學派，具改良之思，抱救國之念，專心向學，務求實得。<sup>9</sup> 證諸顧維鈞在美留學七年的表現，無疑應當把他歸於最後一類。

就顧維鈞而言，處於中西方文化交匯衝撞的歷史大背景下，適逢了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急劇轉型期，由此漂洋過海來到美國，接受別開新境的西方教育，這就使他較之於那些久錮於傳統精神世界的中國人，獲致了一個無可趨及的中西對比參照系。親炙久嘗了西方文明的薰染，使他最初對中國現實的不滿情緒和憂心報國的樸素情感得到了理論上的昇華，使他蓄積涵育的愛國情懷有了價值上的重新評判、觀念上的重新審視。1911年1月，在致美國友人莫特的信中，顧維鈞說：“我注意到，每一個中國學生在旅居國外一年後，他對中國的態度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但總是向好的方面變化。通過比較和對照，他開始拋棄原先的傲慢和偏見，而更真實地觀察中國。在痛苦絕望之際，他常常會放縱自己的情感，在他較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無約束地對處於困

境中的祖國貿然作出評判，還可能激烈地指責中國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對中國的愛一點也不亞於他的同胞，而經深思熟慮後他總能對中國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並因而激發他以更堅定的決心更積極地投身於服務祖國的事業中。”<sup>10</sup>

可以說，在美渡過七年大學生活，比起固步自封的同胞對於外部世界的認識，也就多了一份身臨其境的體驗，少了一份霧?看花的迷惑。雖然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潛移默化，難免使自己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深深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但懷揣了愛國之心、報國之志的顧維鈞，基於比較中所產生的對中西方社會現實的強烈反差，更痛切地深感於故國家園的貧困和落後，也更自覺地意識到了歷史責任的沉重和緊迫。由此，對於自己的愛國情感，也更多了一份理性的審慎，少了一份偏執的狂躁。

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他何以最初選定國際法和外交學作為專業主修課程，又何以最終將《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作為博士論文題目。這篇後來經導師穆爾修改潤色的論文，改為《外人在華地位》而出版。全書分上下兩編，共19章，上編概述了1840年前外人來華的歷史、外人在華所享的權利、中國對外人的法律管轄以及中國對外貿易的規章和組織等內容；下章則詳盡地分析了近代以來治外法權、通商口岸、租界、外人在華旅行經商和傳教的起源與演變，並著重探討了治外法權在中國的產生、對外人的保護、適用範圍及限度等問題。窺其旨意，在於改變不平等的外中關係，維護中國應有的主權。通過研究，顧維鈞認為：“如果中國人民為復興祖國所作出的充滿理智和愛國熱情的努力，能得到列強的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援，那麼一個強大的進步的中國肯定會百倍地迅速地崛起，而進步和強大的中國意味著遠東的永久和平。”<sup>11</sup>可見，大學時代的他始終以滿腔愛國的深情為皈依，以救國救民的重任為指標。

時至1909年，顧維鈞先後獲得了學士、碩士學位。此後二、三年內，他為準備博士學位論文，努力搜集各種有關資料。而發生在校外的一切，同樣在他的密切關注之中。

### （三）

歷史表明，二十世紀初的中華大地上，伴隨著民族救亡的時代主題，孕育化生著一股又一股層相推遞的社會變革思潮，經過庚子以後近十年的急劇變遷，終於彙成洶湧高漲的沖天怒濤，民主革命浪潮如狂飆捲地而來，集合成一股不可阻遏的時代洪流。

就在當年秋天，顧維鈞結識了奔走海外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

那段日子，孫中山正在紐約爭取唐人街海外華僑界的支援。有一日，經同學介紹，顧維鈞同他見了面。顧維鈞記得，當時孫中山談得最多。他談到了準備組織一個革命政黨，相信每一個關心國家幸福的人都應該加入進來；談到了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特別強調了工業化和發展經濟的重要意義；還談到中國必須有一次革命，一旦得到人民的支援，得到有組織的武裝力量的支援，革命就一定會勝利。顧維鈞知道，雖然孫中山沒有明說，但他一直在鼓動推翻滿清政府和建立美國式的共和國。當顧維鈞問起如何推進革命時，孫中山談話中對中國地理知識的熟悉，給他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在他看去，孫中山確實是一位青年領袖，對革命事業充滿信心；而且，熱情洋溢、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令人傾心。那夜長談，一直持續到凌晨3點，在場的人無不為此所吸引。<sup>12</sup>

正如孫中山所說的那樣，中國總有一天會發生推翻滿清的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辛亥革命爆發。

對於海外中國留學生來說，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無疑是激動人心的。“在我們的印象?，起義這樣有力，革命肯定會成功。這就是我們當時的反應。後來，政府派兵到漢口與起義軍交火時，我們消沉了。有好幾天，我們屏住呼吸，急切地等待著消息，希望儘管有鎮壓措施，革命仍能成功。”<sup>13</sup> 那些天的哥大校園?，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常常不約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或閱讀報刊，或掛電報社，關注著事態的發展。有關革命後的中國社會局勢走向，更成了他們最為關心的熱門話題。大家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辛亥革命為在國外學習的年輕人開創了一個有機會報效國家的前景。

但在此之前，顧維鈞是不無憂心，甚至灰心的。原因在於，他一點也不想為帝制時代的大清政府工作。雖然這是父親最矚望他達到的理想人生，老人家為此已想方設法地為兒子的官宦生涯多有準備。但顧維鈞顯然有自己的謀慮。出國留學這麼多年，自己對外交關係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並且也想立志進入外交界，以便為改進中國外交事務的處理方法盡自己的努力，但想起當朝政府的腐敗，官場生活的黑暗，顧維鈞不免多有憤懣和失望之感。所以，當清政府曾想盡辦法鼓勵留學生回國參加政府工作，看到周圍的一些朋友和以前一起赴美留學的同學都已參加了專為回國留學生舉辦的考試，顧維鈞並不急於謀職。<sup>14</sup>

如今民主共和國取代了封建專制這一政治體制的根本突破，正為傳統中國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歷史景象。於是，在顧維鈞看來，為國效力的前景也在驟然間由黯淡變得明朗，蓄積已久的報國心情因此而重新活躍起來。辛亥革命，加強了他回國的願望。

#### （四）

1912年民國建立五個月後，由民國總理唐紹儀推薦、總統袁世凱授意，顧維鈞奉命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兼內閣總理秘書。

學成而歸，初入政壇，年僅24歲的顧維鈞處處顯示出了朝氣蓬勃的工作熱情和銳意創新的精神風貌。作為秘書，最初的工作就是負責總統、總理與外國政府、外國友人之間的一切來往函電。於是，他一方面努力學習有關公關知識，一方面留意觀察、瞭解和熟悉北京。

民國初年的北京，一切都處於新舊嬗變的過渡時期，無論是個人、公眾還是官場生活，到處瀰漫著新舊交替的跡象。但這種變化無疑顯得艱難而緩慢。周旋於總統袁世凱與總理唐紹儀之間，顧維鈞對此深有感觸。雖然，新成立的北京政府正按照共和體制的基本原則進行著改革，但早年留學美國的唐紹儀和軍人出身的袁世凱顯然分屬新、舊兩派，兩人在實施新政，推動政府機構現代化問題上多有意見分歧，衝突幾乎不可避免地經常發生。加上北京政府與革命黨人關係的複雜化，民初政局更加波譎雲詭，權力之爭愈演愈烈。處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政界之中，顧維鈞特殊的受教育背景使他在總統府的舊派人物心目中被視同陌人，自己也覺得處在一個生疏的環境中，多有驚異、迷惘和失望之感。所以，到任一個月之後，當唐紹儀因直隸總督人選任命問題與袁世凱激烈爭吵，矛盾無法調和之餘而憤然辭職，顧維鈞按慣例與其他總理秘書一起辭去職務，並隨後離開北京去天津。此後，在顏惠慶推薦下顧維鈞進入外交部工作，同時仍兼任總統府英文秘書。

其時，新上任的外交總長陸徵祥，正著手仿照西方國家的模式改組外交部。改革措施之一是通過吸收一批受過專業訓練且通曉外文的人才，專職從事外交工作，以便有效地推進中國駐外使館和外交部事務的現代化建設。顧維鈞無疑成為合乎改革需要的適當人選。

外交部秘書處由四名會說不同語種的秘書組成。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參加外交總長或次長和各駐外交團團長的會晤；同時與外國記者，包括與在華出版報紙記者打交道。其中經常性的任務是輪流走訪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各國使節。按照國際慣例，駐外使館若和駐在國政府商討某個問題，應由大使或公使本人或派代表走訪駐在國的外交部，但這種做法，在北京卻恰恰本末倒置。外交總長回復外國使節提出的問題，往往不是把對方招來外交部，而是派秘書前往公使館答復。自1901年喪權辱國的《辛丑合約》簽定後，外國在華勢力的恣意擴張和中國外交地位的空前削弱，使顧維鈞感到了弱國辦外交的屈辱和艱難。所以，為弱國爭外交，為改變中國的外交困境而努力，顧維鈞越來越堅定了自己的這份強烈信念。

為了更好地處理日益紛繁的外交事務，為了協助領導把外交部搞得更現代化一些，顧維鈞開始了他殫思竭慮、多有創意的作品。先是為外交部倡建圖書館。這一建議，早在他離美赴任前夕就已向駐美公使張蔭棠主動提出。徵得同意並獲得專款後，顧維鈞分別用以購買《美國對外關係》、美國革命的外交書信集，以及一套十九世紀以來的大英外國報紙彙編，還有美國議會報告集《藍皮書》和法國《黃皮書》等。這些成套的外交書籍隨即成為外事室圖書的核心，為外交部圖書館建設打下了基礎。此後不久，他又建議設立檔案科，通過編製索引，分類歸檔，提高工作效率。另外，為及時瞭解和掌握最新的國際輿論動向，他還提出了成立翻譯科的建議，並受委任負責。該科工作任務是瀏覽各種外文報紙，把外國報紙上有關中國的新聞報道剪下來，譯成中文存檔，以便隨時向總統府和內閣報告。

這些工作，不僅為改組後的外交部帶來了嶄新的氣象，也使顧維鈞在領導和同事面前贏得了廣泛的讚許。一年後升任外交部參事，職務是輕鬆而清閒的，但他從來沒有空閒過。有人勸他：在北京官場，多做事，多犯錯誤；少做事，少犯錯誤；不做事，不犯錯誤。顧維鈞並不以為然，他認為：“在我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美國的八年，我受教育的目的是想做個有用的人，從那時起，並對中國的外交關係和外交史發生濃厚的興趣。現在終於有了這個寶貴的機會，我確實對我的工作感到樂趣。”<sup>15</sup> 所以，他仍一頭紮進了工作。

## （五）

對於新生的民國政府來說，1912年至1916年，正是政局動蕩、烽煙四起的非常歷史時期。伴隨辛亥革命的爆發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整個國內局勢動蕩不安。西方列強企圖乘機擴張在華勢力範圍，進而吞食中國領土，為此在中國邊境地區煽動武裝叛亂，蓄意挑起事端，如英國之於西藏、沙俄之於外蒙等，邊疆地區出現了新的嚴重危機。

在此四年間，在北京政府處理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中，顧維鈞以他並不起眼的職務，卻扮演了頻頻亮相的重要角色。

首先是1913年中英雙方就西藏問題的談判。整個談判過程，有總統與英國駐華公使的會談，每次均由顧維鈞擔任翻譯。更多的時候，總統直接委派他與英國公使進行交涉。從1月上旬開始的會商，歷時半年達九次之多。此間，英方一手策劃要求召開關於西藏問題的所謂“西姆拉會議”，並強迫中國政府參加，且堅持中英藏三方居平等地位。在第七次中英磋商會上，顧維鈞作為中方全權代表，針對三方“並列論”，鮮明指出：“若准西藏代表以平等資格同時鑒字，是

不啻承認兩藏有立約之權，而等於自立之國”，<sup>16</sup>並在基於歷史事實和當時情況的陳述中駁斥了英方旨在利用中國動亂局勢，製造一個實際上在英國控制下的“獨立”的西藏的陰謀。雙方談判激烈，顧維鈞則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為在談判中從容應付，他曾多次走訪“蒙藏事務局”，找到通曉西藏地理、歷史、制度和風俗，精通西藏問題的專家，及時瞭解情況，磋商問題，徵詢意見，研究對策。這樣，在英使館舉行的會談中，雖說中國方面僅他一人，單槍匹馬之下，充分準備之前，因而每每針鋒相對，對答如流。此後，中國政府雖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同意派員與會，但從來未承認西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締約權，更從未承認西藏可以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有獨立的締約權。至於後來英國誘脅西藏地方代表簽訂的所謂“西姆拉條約”，也最終採取了堅決否認的態度。

隨後圍繞中日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中，顧維鈞更是起了特別令人矚目的作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伺機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妄圖實現它進一步獨霸中國的目的。是年9月2日，日軍藉口對德宣戰，強行在山東龍口登陸，並向青島進攻。面對日本出其不意的軍事行動，袁世凱緊急召集所有內閣部長開會，同時邀請顧維鈞、伍朝樞、金邦平等通曉國際法的三位外交部參事與會。會上，顧維鈞指出：“日軍在龍口登陸，這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因為中國已宣佈對歐戰保持中立。因此，為了表明中國確實在盡中立國的責任，有義務保衛國土以維護其中立立場。因此，抵禦日本侵略，理由至為明顯。”<sup>17</sup>

雖然，袁世凱最終沒有採納他的意見，而是以自己提出的劃出交戰區作為解決方案。但這次會議，正是顧維鈞作為一名外交官首次在政府最高國務決策會上的正式登臺亮相，也是他第一次對山東主權問題發表見解。從此，收回山東主權問題，成了他久久不能釋懷的心結。

待至1915年1月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顧維鈞更敏銳地覺察到日本謀求擴大在華霸權的野心。在他看來，中國急需從國際上獲得外交方面的支援，儘管中國許諾將此事保守秘密，不讓其他國家知道，但這種許諾是在威脅之下做出的，中國沒有義務遵守。基於對社界形勢的分析，他認為唯一能給中國以外交和道義上支援的是美國。因此建議有必要讓華盛頓瞭解二十一條的內容，也應告知倫敦。而在事實上，顧維鈞此時已背著袁世凱，把關於二十一條的消息少量而不斷地透露給了新聞媒體，由此引起了英、美等國的關注和追詢。於是，在徵得袁世凱許可後，顧維鈞與英美公使保持了頻繁接觸。據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事後憶述：“在此期間，顧維鈞博士始終充當中國外交總長和我們之間的聯絡官，儘管我也同時會見中國外交部的其他許多官員。在討論談判的各個階段進行的情況時，顧博士曾多次和我在一起進行長時間的有意思的討論，研究外交策略和進行分析，在這方面，我很欽佩他的敏銳的洞察力。”<sup>18</sup>爭取國際協調交涉、利用中外輿論力量進行外交戰，顧維鈞已在實際上開始構建自己的外交策略。

在中國政府被迫簽約後，顧維鈞奔走勞碌的呼聲，徒成孤掌難鳴之音。但他極力建議政府有必要發表一個詳細的說明，說明整個談判過程中中國政府所持立場以及被迫簽約的經過，以便給後世的歷史學家留下記錄。並為此自告奮勇地堅持抱病工作，連夜口述文稿。這便是當年《東方雜誌》第12卷第6號上全文刊載的《北京政府外交部關於中日交涉始末宣言書》。

愛國心驅使下的事業心和責任心，讓顧維鈞更加深謀遠慮，自覺地意識到了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

1915年，年僅27歲的顧維鈞被任命為駐美公使，正式開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作為最年輕的公使，顧維鈞駐美期間的活動，已日益顯示出別具謀略的經世理念。

以對待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態度為例。顧維鈞出使美國之時，正當袁世凱復辟輿論甚囂塵上之際。1915年8月，在袁世凱授意下，先是由來華擔任總統憲法顧問的美國古德諾拋出《共和與君主論》一文，公開鼓吹帝制。緊接著，以楊度為首發起組織“籌安會”，作為復辟帝制的吹鼓手。隨後，又有袁氏心腹梁士詒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以示萬民擁戴，一時間，遺老遺少上表“勸進”，鬧得烏煙瘴氣。

要說袁世凱對顧維鈞不無知遇之恩，古德諾更是他在留學期間的大學恩師，顧維鈞對此也該有所呼應才是。但事實上，顧維鈞恰恰與之唱了反調。記得早在1912年的秋天，在與袁世凱的一次談話中，顧維鈞就看出袁對民主的內容幾乎一無所知。袁詳細問了他關於“民國”一詞的含義後，對於中國是否能建成真正的民國深表懷疑。他深感，袁不僅不瞭解共和國需要甚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也根本沒有實現民主共和的願望。

顧維鈞確信，儘管中國具有長久的帝制傳統，但在中國人民的天性及其日常生活中，和其他民族一樣酷愛自由；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建立、發展和捍衛民主制度以保障自身的權利。因此，在他看來，復辟斷難成功，崇尚民主共和政體的顧維鈞絕不願與其同流合污。“由於我個人的信念，我在北京時竭力避免與帝制運動有何瓜葛。帝制運動倡導人多半瞭解我的見解和我的政治主張，他們之中誰也不來要求我支援他們的運動。”

到了海外，對於國內的情況自然不太清楚。但至1915年年末，按外交部訓令，要求以後使館正式行文日期要注明洪憲元年，對總統的呈文要用奏摺形式，顧維鈞意識到袁氏復辟幾成事實。憤慨之餘，當即草擬複文，表示難以執行。等接到政府公報，發現使館發給外交部的一份快電上竟注有新年號的日期和“啟奏皇上”字樣，顧維鈞又隨即發電抗議，認為如果一定要這樣做，他就辭職。好在，不得人心的復辟醜劇很快收場，在舉國上下討袁怒潮聲中，袁氏僅僅當了83天的“洪憲皇帝”，便一命嗚呼了。

就此而言，顧維鈞深切憂患的經世品格，已大大有別於傳統的“君國之憂”，賦予了反君主專制、倡民主共和的新型政治理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後，際會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歷史變遷，伴隨了清末民初急劇遞嬗的社會轉型，顧維鈞為民族救亡的時代主題所造就，為西學東漸的近代化潮流所潤澤，也為其特殊的成長道路所規範，最終辟出了一條別開生面的經世從政，外交救國之途。更有他在此期間得以滋養了憂患彌深的民族意識，放眼世界的國際視野，勇於任事的獻身精神等賦有時代特色的經世品格，從此踏上了為弱國爭外交的艱難歷程。

---

1. 徐雪筠等編譯《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第164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2.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3.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4.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5.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6.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7.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8.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9. 陳克明《留學生對於祖國之責任感》，《南美學生季報》第8卷第2號（1921），轉引自章開沅、唐文權著《平凡的神聖：陶行知》第90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0. 引自金光耀著《顧維鈞》第9-1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1. 引自金光耀著《顧維鈞》第16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2.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3.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4.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5.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6. 呂秋文著《中美西藏交涉始末》第23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
  17.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8. 〔美〕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譯《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第115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9. 分別見於《顧維鈞回憶錄》第20、19、21、21、22、22、43、67-68、73、72、109、9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 

## 【教學探索】

### 在規範中理解學術—— "學術研討會"與中國現代史課程中的學術規範訓練

趙立彬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2002-2003學年訪問學人

本科課程教學改革的方式多種多樣，如何在基礎課的教學中開展各種生動活潑的教學互動，在各門課程中都有大膽的摸索。近幾年來，本人結合歷史系本科生“中國現代史”專業基礎課的教學，積極推廣小型“學術研討會”，作為課程改革的實驗，以增強課程的學術含量，從早著手培養學生進行學術研究的實踐，並使學術規範在最初階段便能夠成為學生理解並遵守的法則。這種“學術研討會”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一、“學術研討會”的基本程式

在“中國現代史”課程中開展所謂“學術研討會”的改革，其實是在原有的課堂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的。但原來的課堂討論，一般來說，有幾個缺陷始終難以完全克服：一是參與面有限，發言的同學是少數人，導致一部分同學或者由於對學習不夠積極，或者由於性格上過於內向，而失去或主動放棄發言的機會。二是缺乏互動，往往是一個同學報告後，反響有限，特別是得到的批評意見少、質疑少，如果某個同學報告的題目比較冷僻的話，這樣的情形就更突出。三是同學間缺乏競爭，不少同學是因為老師佈置了任務，以完成任務為目的，報告完之後便萬事大吉，不願作深入的探討，使整個討論的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這種方法，對於低年級的本科生，用於活躍課堂尚可，對於培養學生的學術意識、理解學術規範，則略嫌不足。

有鑒於此，我們從1998年開始，試驗以規範的“學術研討會”的方式，取代原有的課堂討論，先後在96級、97級、98級和2000級歷史系本科“中國現代史”課程上開展這一改革，其做法是：

### 1、確定研討會主題

研討會主題的確定要與本課程的中心內容相結合，使學生通過研討，能回答中國現代史課程的關鍵性問題。作為研討會主題，題目宜大不宜小，要能儘量涵蓋課程教學計劃中的重要問題和學生自己選擇具體論題的興趣。從96級開始，我們分別以“從新三民主義到新民主主義”、“國民革命之成敗與三民主義之命運”、“知識份子與民國政治”等為主題，這些題目實際上涵蓋了中國現代史上最主要的方面，而且學生在其中選擇具體論題的空間非常大，一般的選題都不會超出主題的範圍。如98級研討會的主題是“國民革命之成敗與三民主義之命運”，同學們的選題則可以包含從孫中山領導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至30年代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而且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內容，也因歷史的繼承性（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的繼承和發揚），被容納進這一主題。2000級研討會的主題是“知識份子與民國政治”，許多同學既可以從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談，也可以從民國政治的各個方面來談。學生們在這一主題下，分別從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政治人物、知識份子、文化思潮、教育與學術等領域，選擇具體論題30多種。這樣一來，在研討的具體過程中，既顯得內容豐富多彩，又不會漫無邊際而妨礙相互的討論。確定主題後，由同學自己選擇具體論題進行論文準備。

### 2、論文課題的準備和研討會的分組

學生在研討會主題之內，結合自己的學術興趣，選擇具體的論題。一般鼓勵個人選題，以便能體現學生各自的研究能力。不主張分大組，需要合作者不應超過三人。準備時間為4周左右，學生能夠充分地掌握各自選題的學術史和基本資料。這一過程是學生初步訓練寫學術論文的重要過程，雖然在研討會上只要求提供書面的發言稿，但80%以上的同學都能夠提交完整的基本符合學術規範的論文。同時，選題和準備也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權，使學生在“找論文題目”的過程中本身就得到了學習和訓練，同學們對此也十分重視，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調動。在學生論

題基本確定後，老師根據這些內容進行初步的分類，把研討會分成若干個場次。如“五四運動中的蔡元培”、“章士釗的調和思想”、“陳布雷對民國政治的影響”等論題，都是關係到現代史上知識份子與政局的互動，可以放在一組研討。而“胡漢民的治國思想”、“汪精衛與偽政府的內外政策”、“唐紹儀與1919年南北議和”等論題，都是直接探討政治人物，可以放在一組研討。這樣，一次研討會就被分為4-6個場次，每場有一個基本的亞主題。每一場預定一個課時左右，如果研討得充分，時間上還可以臨時延長。

### 3、邀請評論人和與評論人的交流

這種改革何以稱為小型的“學術研討會”，它與傳統的課堂討論有何區別？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它是嚴格按照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規範來進行的。根據國際上規範的學術研討會的要求，在每一個報告人報告論文之後，應當有一位評論人對其報告提出評論。我們把這一方式引入到研討中來，一方面是為了加強研討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擔任評論本身對於學生也是獲取知識和理解學術的重要途徑。因此，我們要求每一篇論文的作者都要自己在班上請一位同學擔任評論人。論文完成後，至少要提前一個星期要將論文提交給評論人，由評論人準備評論。報告人和評論人不要一一对應，最好不要互評。有的同學因為比較善於提出意見，平時在班上被公認為學術上比較領先，可以被多位報告人邀請為評論人，但也不鼓勵由少數幾個同學包辦評論，因此規定每個同學最多只能充當三篇論文的評論人。“評論人”的角色後來被證明是“學術研討會”最重要的角色，也是用“學術研討會”改革教學獲得成功的最關鍵的因素。

### 4、報告和答辯

在各方面都準備好之後，小型“學術研討會”就“開幕”了。在研討會過程中，我們嚴格按照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程式進行，場地佈置成環形的會議場，設主席座、報告人座和評論人座。主席的職能是主持會場、宣佈程式和控制時間，因此每一場的主席由同學臨時推選，場場不重複，以便多數同學能夠熟悉規範的學術研討會的程式。報告人報告論文，時間一般控制在10分鐘之內，不必照讀論文，重點在於說明論文的選題經過、學術史和介紹基本的材料，使同學能對這一課題有初步的瞭解。最重要的是評論。因為只有評論人系統和仔細地研讀過該篇論文，並且已做好了評論的準備，因此可以有5-10分鐘來進行評論。評論鼓勵多樣化，但主要內容必須包括該論文是否有學術價值、是否合乎學術規範、對於學術史的掌握是否充分、還有哪些方面的問題沒有解決，等等。由於報告人和評論人會前已有相當的溝通，大多數評論都能評得到位。有的評論人為了使評論能夠更加圓滿，自己也把對方的課題進行一定的研究，這樣一來，許多同學實際上同時進行了兩至三個課題的研究。在研討會中，同學們最為關注的已不是報告人的學術報告，而是評論人的評論。因為一篇好的評論，不僅能使同學們判斷被評論的論文的學術水平，而且能夠判斷評論人的學術水平。

評論結束後，每一篇報告還將提供5-10分鐘，由與會的同學向報告人提出質疑，或提供自己瞭解的有關線索，以及自己對該問題的觀點。然後，由報告人對所提問題進行答辯。在這一過程中，報告人可以從廣大同學那裏得到更多的資訊和材料，引出進一步的問題，使自己的研究可以繼續深入。從現場觀察的情況看，一般對於每一篇論文，都有4-6位同學提出新的問題，由報告人作出解釋和回答。遇到有爭議的問題，甚至會發生你來我往、唇槍舌劍的爭論，場面十分熱鬧。

## 二、“學術研討會”在學術規範訓練功能上的優勢

利用“學術研討會”的形式來進行課程討論，經過幾年的實踐總結，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好處：

## 第一、學生從學術研討會中學習到學術論文撰寫的規範和學術會議的規範。

中國現代史課程是歷史系二年級下學期課程，對於這批同學來說，一般都是初次撰寫完全合乎學術規範要求的論文。“學術研討會”的形式，促使同學們認真對待論文的寫作，至少從形式上合乎學術規範。從遞交的論文來看，雖然在學術水平上參差不齊，但多數同學都已掌握了學術論文的基本格式，從文面上來看，有內容提要、關鍵字、注釋、參考書目；從內容上看，許多論文都清楚地交代了選題意義、學術史、資料分佈，而且引文必有注釋，引用他人觀點也有清楚的說明。

同時，在研討時引導同學們嚴格按照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規範進行，也使同學較早地熟悉學術討論的基本規範，學到了如何舉行學術會議的知識。每一場研討的主席都能克盡職守，報告人和評論人以及自由提問時發言的同學，都學會了遵守規範、尊重他人、控制時間、講究禮貌，答辯的同學也本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實態度，虛心接受意見，不強詞奪理，不做無意義的爭辯。研討結束後，同學們感到學術研討禮儀本身也是自己的收穫。

## 第二、為學生的課題研究成果提供發表的場地，調動同學們選題、寫論文和參加研討的積極性。

“學術研討會”的功能，就是使全體同學都能投身於研討之中，每個人都不例外。通過學習、查資料後寫成的論文，能夠向全體同學報告，並由全體同學從學術的角度加以評判，本身對廣大同學就有一個激勵的作用。因此，同學們在準備論文的時候，都十分積極，力爭能夠在研討會上提供優質的研究成果。從幾屆研討會的情況看，同學們撰寫論文參加研討的熱情非常高，而且儘量獨立從事課題的研究，2000級學生共40人，為“知識份子與民國政治”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有32篇。合作撰寫論文的同學，雖然報告論文的只能有一人，但合作者在聽眾席上也積極擔任答辯的任務，或者為其他論文擔任評論人。總之，同學們都把“學術研討會”看成是鍛煉自己的一次難得的機會，有的同學在研討會前沒有來得及將場次排定，在研討會開始前還急忙要求組織者補充安排，或者請求優先安排在前面發言。

## 第三、從學術競爭中激發學生的研究熱情，培養對學術精益求精的精神。

“學術研討會”另一個無形的功能，就是激發學生的競爭意識，通過撰寫、報告論文和評論來開展學術競爭。“學術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展示的平臺，不管是報告人，還是評論人，或者是自由發言的同學，其思考問題的深度、資料檢索的廣度、演繹和歸納乃至發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術水平，都在研討會上得到公開展示。這樣使得同學在報告和評論時能夠完全拋開一般意義上的同學感情或友誼，以學術為本，誠懇地提出意見和建議。在98級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一位同學評論她的一位好朋友（因為評論人是報告人自己邀請的）的論文，劈頭就說：“我個人認為這篇論文距離學術的要求還很遠。”雖然沒有給報告的同學留顏面，但卻使全體同學都能從學術的角度有所收穫，也使報告人本人真正體會到學術容不得半點額外的因素。因此，“學術研討會”可以說是使廣大同學受到一次好的學術精神的教育。正是因為如此，同學們都能認真對待“學術研討會”，撰寫論文時精益求精，講求學術規範。儘管本科生查閱資料受圖書館有關規定的限制，特別是珠海校區，圖書資料尚未齊全，但同學們都想方設法，盡可能地充實、完善自己的論文，力爭出精品。從提交的論文看，有些論文的學術水平確實遠遠超出了預料。如2000級劉焱鴻同學的《文化視野下的吳宓》、謝湜同學的《唐紹儀與1919年南北議和》、吳昱同學的

《1922年胡適對孫中山、陳炯明認識的一種詮釋》等論文，如果略加整理，完全達到了公開發表的水平。

總的來說，運用“學術研討會”的形式來推動本科生基礎專業課的教學，成效十分明顯，同學們在自身參與的實踐中受到了良好的學術規範的訓練。據對有關同學開展的調查，廣大同學對這一形式也十分歡迎。不足之處在於：目前學生研討的硬體條件不是很理想。要找一個適合於舉行學術研討會的教室並不容易，而且音響設備沒有辦法解決，容易受到其他教室的干擾。研討會後的論文整理工作比較困難，缺少進一步編印出版的途徑。研討會前未能將論文複印，使與會者人手一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討論的深入。這些缺陷，以後將爭取經費予以解決。

## 【史學新聞】

###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 2002年活動簡報

#### (一)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講座

講次	日期	講者	題目	主持
第21講	2002年3月7日 (星期四)	李志剛牧師 (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	早期中國基督教入傳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第22講	2002年3月21日 (星期四)	陳佐才法政牧師 (聖公會牧師)	當代香港基督教的宣教方向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第23講	2002年4月29日 (星期一)	王立新博士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基督教華傳教史研究主要範式述評	李金強博士 (浸大歷史系)

註：第1-20講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辦。

#### (二) 中國近代史講座

講次	日期	講者	題目	主持
第1講	2002年6月11日(星期二)	Prof. David Pong 龐百騰 教授 (Professor of History & Director of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the Liang Jiang	Dr. Wong Man Kong黃文江博士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ovinces in the Early Guangxu Era, 1875-1880 光緒初年(1875- 1880)兩江地區的經 濟復甦	(Department of History)
第2講	2002年11月21日(星 期四)	趙立彬博士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 授)	在正統之外:《知止 軒隨錄》與李燮和辛 亥革命史蹟	林啟彥博士 (浸大歷史系)

### (三) 公共歷史講座

講次	日期	講者	題目	主持
第1講	2002年11月26日(星 期二)	劉蜀永教授(中國社 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 所研究員)	香港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周佳榮博士 (浸大歷史系)
第2講	2002年12月4日 (星期四)	Prof. Takeshi Hamashita 濱下武志教授(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Migration and Home Remittance Betwee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rough Hong Kong 19-20th Century	Dr. Lee Kam Keung 李金強博 士(Department of History)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史學新聞】

##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 研究支援網絡研討會介紹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院研究支援網絡研討會」(Research Support Network Seminars,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KBU), 其中2003年3月7日舉行的一次由浸大歷史系負責。研討會由李金強博士主持, 共有兩個演講, 題目、講者及內容提要如下:

新東亞時代: 中日韓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交融

講者: 周佳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暨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 內容提要：

東亞一詞，如用於古代歷史，是指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由於這些國家都受到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影響，又使用漢文或從漢字演變出來的文字，所以稱為「中國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其後越南被列為東南亞國家之一，東亞地區所包括的範圍便相對縮小了。

隨著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興，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東亞與東南亞各國間的關係日趨頻繁，在二十一世紀今天已形成一個有緊密聯繫的新東亞地區。中文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逐漸增強，說明了古代的漢字文化圈正在復興；中日韓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交融，更宣告新東亞時代的來臨。

這一格局的形成，實建基於鄧小平理論及其外交政策；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使日本、韓國及東盟諸國，不論官方或民間，都積極對華投資。日本、韓國的商品，連同大眾文化如電影、電視劇集等，相繼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廣為流行，而有「哈日」、「韓流」等現象。

另一方面，日本、韓國以至東盟諸國，都有「中國熱」的興起，不但國內學習中文的人數與日俱增，到中國留學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說，中國因素在日、韓等東亞國家正在加強，造成一定程度的「中國化」。

中日韓文化的交匯和合流，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稱為「儒教文化」或許未必恰當，但儒家文化必然在東亞文化中佔一重要席位。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如要更上一層樓，實有賴文化方面的配合；新東亞時代到來，亦有助於維持世界和平。

## **(二) 誤讀與曲解：民國史上的全盤西化論**

**講者：趙立彬博士（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訪問學人）**

## 內容提要：

全盤西化論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影響甚著。陳序經與胡適是主要的代表人物，而兩者之間也存有差異。陳序經對全盤西化論主張最力、堅持最徹底、理論形態最為完備，胡適的主張雖然有策略考量的因素並且最終放棄了這一提法，但以其學林領袖的地位而對此一思潮的影響，更在陳氏之上。

全盤西化論引發了近代思想史上的多次論戰，其中1935年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論戰最具代表性。論戰擴大了全盤西化論的影響。

全盤西化論並非空洞口號，而是具有嚴密的學理基礎，即陳序經的文化學思想。其主要方面為廣義的文化觀、文化整體論、以及對文化進化論和文化傳播論的整合，理論淵源則來自於西方的人類學和社會學。

歷史上全盤西化論屢遭誤讀與曲解。全盤西化論者是否民族虛無主義者、全盤西化論是否非理性的主張，均可進一步討論。全盤西化論以其明確的崇西性和不妥協性，反映出文化激進主義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趨勢，是文化激進主義的一種極端形態。

結論：全盤西化論是學者基於學理的一種“實驗室設計”，其越是著眼於整個民族的命運和整個國家的出路，它就越陷入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矛盾困境之中。而在現實社會中，沒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作為依託，任何理念層面的主張都決無實踐的可能。縱觀20世紀，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都呈現出與原髮型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的歷史軌跡，沒有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通過“全盤西化”而實現。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史學新聞】

### 香港學界活動簡報

####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學術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於2003年1月10日舉行研究生交流日，同日舉行學術研討會。開幕儀式由系主任周佳榮博士致詞，並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梁元生教授擔任嘉賓學者，作專題演講，講題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視域」。

報告論文共有七篇，分三節進行：

##### ❖ 第一節（林啟彥博士主持）

周子峰：近代的廈門市政建設運動及其影響（1920-1937）

范永聰：《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發展

##### ❖ 第二節（李金強博士主持）

林錦源：張蔭桓與《三洲日記》——一位晚清駐美公使對西方的認識

侯勵英：學術史上的蔡元培——以中國大陸學者研究成果為例

##### ❖ 第三節（黃嫣梨博士主持）

盧嘉琪：朱熹治閩期間對女性的教化

羅婉嫻：1894年鼠疫前後香港西方醫學專業地位的演變

文兆堅：中外學界對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回顧

最後由周佳榮博士作總結發言。來自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以及浸大歷史系博士班、碩士班畢業生，亦有出席此次活動，充份達到學術交流及師生聯誼的目的。研討會上發言的論文，將以專集形式出版。

#### ➤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近代史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辦「中國近代史講座」（三）於2003年2月17日舉行，由林啟彥博士主持。此次公開講座共有三個講題：

(一)「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近代史史書的編纂」，講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海鵬教授；

(二)「十六大以後的兩岸關係」，講者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副理事長陳孔立教授；

(三)「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國民教育』問題」，講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汪婉女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團共有七個成員，除上述三位外，還包括：王正教授、王蘇粵教授、盧曉衡教授及鍾安西教授等人。

當日共有三十餘人參加中國近代史講座，包括來自香港多間大學的專家學者和研究生。

### ➤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年會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3年年會於2月28日晚上假座九龍尖沙嘴映月樓舉行，首由會長黃嫣梨博士致歡迎詞，繼由大會嘉賓香港浸會大學校長吳清輝教授、北京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何芳川教授講話，與會人數五十餘人。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在2002年參與主辦的活動，包括「第二屆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及「第九屆社會史國際會議——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此外，與香港電台文教組合辦「神州五十年」廣播節目，並邀請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黃兆強教授來訪。

2003年的交流活動，繼2月17日宴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團之後，將於4月間邀請華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交流團來港訪問。大型學術活動有二，其一是與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合辦「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6月12日至14日在香港舉行），其二是與上海太平天國專業委員會合辦「上海小刀會暨東南民眾運動學術研討會」（8月中在上海舉行）。

### ➤ 環太平洋地區的歷史發展與中國講座系列

2003年1月至3月舉行，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講座系列之一，北京大學歷史系何芳川教授主講，內容如下：

- 碧海青光覓古縱——環太平洋地區遠古時期的人類活動；
- 半串明珠耀大洋——古代太平洋文明與中國；
- 忽聞海上有仙山——古代中國與太平洋諸民族的航海活動；
- 亞美行加誰先登——古代中國人與美洲的發現；
- 徘徊近代大門外——歷史上的鄭和遠航；
- 葡萄牙人與澳門——早期西方殖民者在中國與東亞的活動；
- 冒險與征服時代——十六至十八世紀西方人對太平洋的探查活動；
- 商帆航自馬尼拉——中國人與橫跨太平洋的商貿活動；
- 星條旗飄太平洋——兼論早期美中關係；
- 是理想還是空想——從人類歷史的發展看「太平洋時代」與廿一世紀的中國。

### ➤ 香港中文大學傑出學人學術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四十周年傑出學人學術講座於2003年3月1日舉行第一次演講，由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榮譽講座教授、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主講，題目為「《詩》與古史——從新出土楚簡談玄

鳥傳說與早期殷史」。此次講座的内容，主要討論：（一）鳥的崇拜和象徵；（二）玄鳥故事與簡狄；（三）楚簡記玄鳥和坼背降生的傳說。與會者數百人，座無虛席，香港電台並即時在網上直播，可說是本年度香港學界的一次盛會。

### ➤ 香港浸會大學「古今中外」系列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主辦的「古今中外」系列講座，於2003年3月及4月間舉行，包括以下四講：

1. 「融舊鑄新，開宗立範——戰國銅鏡的工藝與風格」（3月5日）；
2. 「青峰綠成碧玉——從越窯到龍泉窯的青瓷藝術」（3月6日）；
3. 「從艾儒略到馬禮遜——晚明入清基督文明在華策略檢討」（4月2日）；
4. 「西濤拍岸：『前五四文學現象』的文化溯源反思」（4月3日）

講者張錯教授，現職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系主任及比較文學系教授。張錯教授的近著《利瑪竇入華及其他》，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

### ➤ 香港浸會大學與茨城基督教大學交流日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Ibaraki Christian University）文化交流學科學生十四人，在青柳真智子教授（Prof. Aoyagi Machiko）及齊藤聖二教授（Prof. Saito Seiji）帶領下，於2003年3月中訪問香港，並於13日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師生舉行交流日。

交流會首先由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博士致歡迎詞，雙方並交換紀念品。然後播放介紹浸會大學及中國文化的短片，再由浸會大學歷史系黃文江博士講述香港發展簡史。

接著進行的中日師生交流會由浸會大學歷史系黃嫣梨博士主持，歷史系秘書陳嘉儀小姐擔任日文翻譯，浸大歷史學會幹事、歷史系學生及研究生十餘人，亦參與討論。會後參觀浸會大學圖書館、學生宿會，並在校內聯福樓午膳。

此次交流以多種語言進行，包括日語、英語、普通話，還有廣東話和德語，港日兩地的大學生進行了親切的交流，肯定亦可加強今後的文化聯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